

国民政府主黔时期贵州盐价高的问题研究

李浩,蒙锡正

(贵州民族大学 校长办公室,贵阳 550025)

摘要:国民政府主黔时期(1935—1949年),贵州盐政问题多多。其中一个突出问题是贵州食盐价格高且曾居高不下。这一问题不仅直接导致贵州人民遭受盐贵淡食之苦,而且还影响了贵州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其主要表现为:加重了贵州人民的经济负担,加深了贵州人民的淡食之苦,限制了部分生产部门的正常发展,导致了食盐走私严重,扰乱了经济正常运行,影响了社会稳定等等。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原因有:运入贵州的食盐成本增加,不法盐商为谋暴利而投机经营,贪官为谋取不法利益而营私舞弊,国民政府对盐课以重税的政策等。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分析有助于探求近现代贵州盐政的发展演变规律,有益于丰富民国贵州地方经济史、民国社会史、乃至抗日战争经济史研究,并为当前的盐业经济管理提供历史借鉴。

关键词:私盐;盐政;盐价;盐税;国民政府;贵州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80(2015)04-0034-07

国民政府主黔时期(1935—1949年),贵州盐政问题多多。其中一个突出问题是盐价一路高涨,尤其在1948—1949年,盐价高得离谱。食盐是老百姓的日常必需品,盐价高问题不仅直接影响人民的生活,而且还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发展。从目前笔者管见,对当时食盐运销的研究较多,但对当时贵州盐价高的问题还鲜见系统的探索。探讨当时盐价高的问题可以丰富贵州地方史、抗战经济史、民国社会史研究。

一、国民政府主黔时期盐价居高不下的表现

(一)贵州盐价不断增高

1935年国民政府控制贵州,把盐政管理权收归中央。四大家族的势力跟着渗入贵州,逐步控制贵州的食盐运销大权,并以此作为剥削人民的重要手段。1936年后,贵州盐价逐年增长。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5XZS025);贵州省社会科学基金(14GZYSB35)

作者简介:李浩,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E-mail:Lihao1976@126.com)

只是在 1940 年以前,贵州盐价涨幅不高,对人民生活冲击不明显。

1940—1941 年盐价变动的幅度比较大,根据史料记载,该时期贵州有些地区的盐价增涨了几倍,如赤水 1940 年每市担盐价为 85.96 元,而 1941 年每市担盐价涨到 536.00 元,都匀 1940 年每市担盐价为 140.86 元,而 1941 年每市担盐价涨到 809.00 元^[1]。

抗战胜利后,贵州盐价变化快,增长的幅度非常大,盐价奇高。1946 年“每百斤盐售价超过 1 万元,以后更加飞涨”^[2]。1947 年“川盐入黔的要道赤水县,盐价由年初每担 4.6 万元涨到年底的 43.9 万元,差不多上涨 10 余倍”^[3]。时人刘熙乙在《解决贵州食盐问题建议书》中指出,惊人盐价的出现,“致演成一千元购一斤盐,以致一千二百元购一斤盐不合理之现象”,在农村出现“购盐一斤,须付三斗苞谷代价”^[4]。到 1948 年 11 月,盐价高达每斤 300 万元。当时贵州各地区盐价具体情况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黔区各据三七年(1948 年)十一月奉电后调整商盐最高一览表^[5]

单位:金元

据点	盐别	每市担商盐最高价	据点	盐别	每市担商盐最高价
贵阳	花	97.94	安顺	巴	131.07
贵阳	巴	107.38	龙滩	巴	79.98
茅台	巴	73.37	思南	巴	100.64
遵义	巴	85.46	镇远	巴	145.06
毕节	健巴	106.06			
毕节	富巴	89.03			

注:上列各据点商盐各最高价按川康局产联 1537 号戍佳电核定。

从表 1 可知 1948 年 11 月贵州销区的盐价均价为 100 金元左右,即 30000 万法币^①。由此可见,每斤盐高达 300 万元法币。

(二)与周边地区相比贵州盐价居高不下

与同期国统区的盐价(见表 2)相比,贵州的盐价偏高。如再以 1940—1941 年为例,由表 1 可知:1940 年,国统区平均每市担盐价 45.27 元,贵州盐价每市担为 85.96 元(赤水)、140.86 元(都匀);1941 年,国统区平均每市担盐价为 440.18 元,而贵州盐价涨到 536.00 元(赤水),809.00 元(都匀)。

表 2 国统区盐价比较表(1937—1945 年)

单位:每担法币元^[6]

年份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各年平均价	10.86	14.64	21.71	45.27	145.38	440.18	933.77	3444.96	13557.56
指数	100	134.81	199.91	416.85	1,338.67	4,053.22	8,598.25	31,721.55	124,839.41

与同期其他省相比,贵州盐价亦偏高。1940 年,四川“一等巴盐每担 57.90 元,二等巴盐每担 57.80 元”^[7],而贵阳盐价“(1940 年)每市担为 85.96 元(赤水)、140.86 元(都匀),贵阳要高两倍多”。“1947 年 2 月份,宜宾巴盐每担价为法币 7.85 万元”^[8]。而 1946 年底,贵阳每市担盐价高达 46 万元。

又以与长沙(见下表 3)相比,以 1946 为例,“贵阳每市担盐价为 10 万元(1946 年初,法

币)”,而“长沙每市担盐价为 40,332.10 元”。贵阳盐价远远高于长沙。

表 3 湖南长沙食盐零售价格及其指数统计表(1937—1946 年),基期:1937 年 1—6 月平均=100 单位:每担元^⑧

区别	重要县市	1937		1940		1943		1946	
		零售价	指数	零售价	指数	零售价	指数	零售价	指数
湖南	长沙	15.50	100.0	70.84	523.6	1,376.39	10,172.9	40,332.10	260,207.1

二、国民政府主黔时期盐价高的影响

国民政府主黔时期,贵州盐价高问题对本来食盐紧缺的贵州造成了一系列的不良影响。贵州省档案管有不少资料反映了这些影响,现归纳分析如下。

(一)加重了人民的经济负担

盐价高给贵州人民,尤其是边远地区的农民,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如“黎平、榕江等县,要五十至八十斤大米才能换一斤盐”,“紫云县四大寨一带,每斤盐售价四斗白米”^[8]。1946 年,“雷山县换盐一斤需苞谷三至四斗”,“四月之食换一月之盐”,“一家农人每年耕作之收入,只能换盐十余斤,何等严重”^[4]。到 1949 年,贵州较普遍的易货行市是“斗米斤盐”。据《三合县志》载:“黔地贫瘠,生产不丰,即盐价低贱之时,亦有四分之一人口无力食盐,非遇婚丧节庆不入盐市,其生活困窘,业已不堪其苦。”^[9]时人刘熙乙指出:“农村的人民食盐负担之重,实堪痛心”^[4]。

(二)加深了人民的淡食之苦

贵州不产盐,人民食盐历来依赖邻省供盐,长期遭受盐贵淡食之苦。国民政府主黔时期的盐价高的问题不仅加重了人民的经济负担,而且加深了人民的淡食之痛苦。人民食盐之惨状更是无法形容。国民政府主黔时期,贵州边远地区还存在着令人心酸的食盐“怪方法”:“洗澡盐”或“打滚盐”、“供菩萨盐”、“挂吊颈盐”或“望盐”。有些地方“甚至用绳索将质量低劣,卤味不纯的巴盐拎起来,每次在菜汤里捌一下,是有盐吃的象征,故谓之‘象形盐’”^[10]。

(三)部分生产活动受到影响

盐价太高对与用盐有关的轻工业生产、农业生产造成了不少困难。当时一些肥皂厂、制酱厂等用盐量大。而由于盐价高,食盐的销售管理很严,盐务管理局不但严格控制需要用盐的工厂购盐数量,而且常派专人现场监督其用盐的过程。为维持正常生产,这些厂的老板想方设法向盐务总局争取平价盐、低价盐;但是盐务管理机构常常以各种进行推脱,不能满足其需要,使其生产不能正常进行。

农业生产中“重要作物选种用盐”也受到限制。国民政府主黔时期,食盐用于农事活动必须经农林部与贵州盐务管理局协调,办理相关手续后,方能获得相关食盐。一般程序,农民将农业用盐情况向有关农林部门逐级上报到农林部,农林部再向盐务管理局申报农业用盐之需,盐务管理局专门复函农林部。档案资料中有许多复函。复函中除言明“重要作物选种用盐之重与用量规定”。并说明按“此种规定通常均以普通盐,尚未参杂者,即合实用之规定百分比,选种用盐因种子之不同,浓度亦异。一般言之,盐水浓度应与被选种子之普通比重相等”^[11]。如下表 4 所示:

表 4 重要作物选种用盐之比重与用量

作物种类	水稻(粳)	水稻(灿)	水稻(糯)	陆稻	大麦	小麦
浓度比重	1.10-1.13	1.08-1.10	1.08-1.10	1.08-1.10	1.10-1.13	1.22
一公斤水应加盐量	2-3	1.5-2	1.5-2	1.5-2	2-3	2.5-3

上表亦印证了盐价高、食盐紧缺导致农业用盐不便。

(四)导致了食盐走私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运行

食盐在贵州历来为抢手商品,很受人民青睐。国民政府主黔时期,盐价高导致了食盐走私严重。贩私者常与地方官员、税警、帮会串通一气,合伙贩私等情事,更是不胜枚举。贵州省档案馆里关于商人、官员、小商贩、甚至军队走私食盐的案卷非常多。笔者曾有专文论述,不再详述^[12]。

国民政府主黔时期,关于食盐缉私方面,虽然缉私机构更为庞大,缉私组织更为严密,查私人员大为增加,盐所巡卡更加棋布星罗,缉拿手段更为多样,缉私甚是严厉;但由于各种原因,缉私收效甚微。严厉缉私不仅未达预期目的,反而使贵州盐价更高,使贵州人民的盐贵淡食问题更为严重。

盐价越高,意味着走私越有利可图,从而使走私盛行。而政府为了维护其盐税收入,必定会采取强而有力的缉私措施,从而使政府加重食盐缉私。食盐缉私越严,就需要越多的缉私机关和缉私武装人员,就需要更多地财力、物力和人力,需要更多的花费,就需要征收更高的盐税,这些花费最终又摊在食盐上,进而无形中提高了盐价。这样出现了“盐价高—走私严重—缉私严厉—盐税重—盐价高”恶性循环,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破坏正常的市场运行,阻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

(五)影响了社会稳定

盐价高诱使不法商人囤积居奇,谋取暴利,贪官营私舞弊,谋取私利,导致世风日下,引起了人民对国民政府的不满,导致人民与盐务机构甚至政府机构的矛盾不断加深。盐价高,也引起了匪徒对盐道的关注。这一时期,贵州盐道成了土匪出没之地。这些问题导致了人民处于不安定、不安全的社会环境中,容易引起社会问题。

三、国民政府主黔时期盐价高的原因

为什么这一时期的贵州盐价如此之高呢?从现有资料来看,贵州盐价之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所引致。

(一)运入贵州的食盐成本相对较高

需指出的是,1949年前,有一客观因素始终是导致贵州盐价高的主要原因,即贵州不产盐,为食盐纯销区,且贵州地处云贵高原,又是“山国”,交通落后,运盐难度相对增大,客观上使运入贵州的盐的成本相对要高一些,因而贵州的盐价相对较高。

1935—1949时期一直是战火不断,许多地区的产盐量受到很大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对贵州食盐的供应。再加上战乱时期,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匪患不断,不确定因素增加,运盐的风险加大,使运入贵州的食盐成本增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盐价居高不下^[13]。

(二)不法盐商为谋取暴利而投机经营

为牟取暴利,部分盐商侵吞和囤积食盐,故意不办计口售盐,妄图达成盐荒,再抛售高价私盐。如“据财政部贵州盐务办事处代电(1941年12月12日):“查各地零售盐商常有因资本不充,招月不能购运足额,甚至有故意不购,希望造成盐荒,以便非法渔利,索牧民食,殊非浅鲜”,“不择手段,牟取高利。”^[14]另如“据报锦屏、黎平食盐运输监销似成问题。计价值较低者为销粤盐区县份,每斤自二元七八至三四元不等。销川盐区则每斤自四元六角至六元五角。纯利规定不得越出二分,但事实上何止一角。如短秆、包厚纸等弊,各县皆然。最不易管理者为区保人员办理分销,增价、短秆、包厚纸而不足,少卖公盐,作走私贩运。现雷公山附近边界,每斤私盐售价八元,锦屏、黎平交界则为十元一斤。此就有盐接济正常状态而言。至于县政府督饬欠周,而又参加官股,为少数商人所包办,则百弊丛生。百元股本,匝月可获五六十元之纯利,病民久甚!”^[14]

(三)贪官营私舞弊,谋取不法利润

贪官勾结不法商伙同抬高盐价,盘剥各族人民。如“1941年,锦济县将九月份低价存盐加价出售,溢受盐价共计二万零七百元,还冠冕堂皇地解释抬价的理由是什么‘谋与邻县盐价平衡’。”^[15]另如“长顺县群众曾控告有关官、绅、商违法操纵食盐事件。因为杨泰和等抬高食盐价格,民情恐慌,民众联名申请准予扣留杨泰和。但由于本区盐政由新任区长吴永福主持,而吴与杨互相勾结,如不扣留,转至区所,则盐未可能减价。请政府派员调查撤究以惩奸贪而资求救济。申请云,商人杨永泰登记本区每月认购食盐一百市担,每场平均理应二十担,而每场食盐止能驮之十五担,各场都驮不足额,而本区区长扶同主谋包庇,每场提款一百二十元,该杨永泰又提款一百二十元之外又驮到本区发小商又每担提款十元,任意操纵,居奇抬高盐价。如本年三月内议定每担盐价二百五十二元,至四月以来每斤花盐增至四元七八角,又至五月内议定每斤花盐五元三角。民众痛苦不堪,淡食恐慌,人言啧啧,民众如水火之中为持联名申请”^[16]。

(四)政府对盐课以重税

战乱时期,盐税收入是国民政府数额较大的,且来得最快的收入。“战前,关税、盐税、统税为中央财政的三大支柱,其中关税位居首位,一般占全部税收的50—60%,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盐税居第二位,约占20—30%。”但是到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盐税收入比重日益增加,尤其在推行食盐专卖后,“仅1942年就征收143737万元,为关税收入的9倍多,占国税收入的32%,超过关税收入位居首位。”1944年后,“盐税收入已占到国税比重的60%,在全国财政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17]

除了历年递增的正税外,各种名目繁多的中央附税、地方附税亦加重了食盐者的负担。自1936年国民政府把贵州盐权收回中央后,就把食盐作为重要税源,不断增加税项。据顾文栋先生不完成统计:1936—1949年,关于盐的税有正税、外债附税、统一附税、征盐场整理费、征黔省建设公债基金、征建设专款、征盐巡经费、征平衡盐价基金、征营运价款价本费、按销价百分之五征意外损失准备金、按销价百分之三十征销税、征公益费、整理费、征战时附税、征优待国军副食费^[18]。

抗战胜利后,虽然取消战时附加和国军副食等名目,但食盐还照旧征税,由于通货膨胀,“又每百斤食盐盐税增至 7400 元”^[1]。“1947 年 8 月,每百斤盐税为 10 万元,盐价更是天价了”^[2]。到了“1948 年 3 月每百斤盐税为 35 万元”^[3]。

国民政府为了保证其税收不减,抬高盐价,从而导致盐价呈上升趋势。

四、结 语

针对贵州盐价高的问题,贵州盐务管理局及地方政府亦曾采取一些措施管理盐务,调控盐价,但收效甚微。其深层次原因是国民政府的局限性所导致的,是国民政府逐利动机使然。如果政府降低盐税,贪官不从盐商那里捞取不义之财,则耗费在食盐的“浮费”自然减少,盐价也就会跌下来。如果政府投入一大笔资金用于运输食盐,则可以增加食盐运输量,减少商人的盘剥,同时还可以增加国家收入。但是源于阶级局限性及历史局限性,当时的政府没有也不可能这样做,因而,贵州盐贵淡食这一重大问题一直无法解决。1949 年后,人民政府吸取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采取政府运销食盐,并实行低税甚至无税政策,因而,在 1949 年前数百年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人民政府在短短的几年内就解决了。由此可见,政府管理动机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注释:

①1948 年 8 月 19 日,蒋介石颁布《财政、经济处分令》,国民政府同时公布《金圆卷发行办法》,规定法币 300 万元折合金圆 1 元。(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贵州省志·金融志》,方志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5 页)

参考文献:

- [1] 贵州省各存盐地官定牌价(民国廿八年至三十一,根据贵州省盐务管理局造送资料编制)[M]//谭启栋.贵州省统计年鉴胜利纪念特辑.贵阳:贵州省政府统计室,1947:348.
- [2]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财政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68.
- [3]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工商行政管理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92.
- [4] 刘熙乙.解决贵州食盐问题建议书[Z].贵州省图书馆,1947.
- [5] 关于调整食盐仓价、零售价调整税率,附加税[A].贵州省档案馆馆藏史料:M41-1-4119.
- [6] 丁长青,唐仁粤.中国盐业史·近代当代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09,207.
- [7]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盐业志[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166-167.
- [8] 刘治书.贵州山区食盐供应今昔[N].大公报.1964-09-26.
- [9]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财政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69.
- [10] 钱俊瑞,徐雪寒,王渔邨,等.中国经济问题讲话[M].上海:新知书店,1983:49.
- [11] 有关对工、农、渔业食盐的配销[A].贵州省档案馆馆藏史料:M41-1-3600.
- [12] 李浩.1935—1949 年贵州食盐紧缺主要表现[J].盐业史研究,2013,(1):37-43.
- [13] 黔区各岸边岸盐款、盐斤保险试行办法暨有关运输盐保险文件[A].贵州省档案馆馆藏史料:M41-1-2972.

- [14] 铜仁、江口公卖处盐商抬价走私、囤积操纵暨有关调查处理文书[A].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M41-1-168.
- [15] 唐载阳,张树良,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商业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154.
- [16] 长顺县群众控告有关官、绅、商违法操纵食盐暨调查处理文书[A].贵州省档案馆馆藏史料:M41-1-1702.
- [17] 鲁子健.抗日战争时期的四川盐业[J].盐业史研究,2008,(2):18-22.
- [18] 顾文栋.贵州近代盐荒论[J].贵州文史丛刊,1984,(1):17-29.

责任编辑:梁 雁

The Main Causes of the High Price of Salt under the Governance of Kuomintang Government in Guizhou

LI Hao, MENG Xizheng

(The President Offic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Guizhou,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Kuomintang governance in Guizhou (1935-1949), one of the many problems was the high price of salt in Guizhou and it could not come down for a long time. This problem had led to two problems, one was that people in Guizhou suffered from expensive salt and saltless diet, the other was that it had affected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Guizhou's economy and society. The bad effect includes aggravating the economic burden of the people in Guizhou, deepening Guizhou people's saltless diet, restricting the normal development of some production departments, serious smuggling of salt, disrupting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the economy, and affecting the social stability and so on. There were many causes for this problem including the increased cost of salt transportation into Guizhou, unscrupulous merchants seeking profits and speculative business, corrupt officials seeking illegal interests and engaging in malpractices, an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mposing a heavy tax on salt. Focusing on this problem may help to enrich the local economy and history research in Guizhou at that time, the research of economy development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explore development evolution of modern salt policy in Guizhou today and provide a historical reference for salt industry economy management.

Key words: illegal salt; salt administration; salt price; salt tax; Kuomintang government; Guizhou